



# 场域和资本对傅惟慈外国文学翻译活动的制衡影响

荆素蓉, 李文华

(山西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在历经多次社会变革的翻译生涯中,傅惟慈出版了三四百万字的译著,各种时代因素都对其外国文学翻译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视角来看,在诸多因素中场域和资本尤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依次探讨了权力场域和文学场域以及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对傅惟慈文本选择与译作出版的制衡影响,以期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翻译研究、社会翻译学研究及其他相关研究提供补益之资。

**关键词:**傅惟慈;外国文学翻译活动;场域;资本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21)01-0052-04

一直以来,对于翻译家的研究都是翻译学领域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文学翻译界,傅惟慈(1923—2014)的名字与毛姆和格林二人连在一起,犹如朱生豪之于莎士比亚或者傅雷之于巴尔扎克。傅惟慈曾两次担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通晓英、德、法、俄等多国语言,一生出版了数百万字的外国文学译作,其翻译活动深受所处时代语境中各种因素的影响。借鉴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观点,我们认为,在诸多因素中,场域和资本尤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本文将分析探讨傅惟慈所处的时代场域和所拥有的各种资本对其外国文学翻译活动中文本选择与译作出版的制衡影响,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对已有研究有所充实与补益。

## 一、傅惟慈外国文学翻译活动概述

傅惟慈1923年生于哈尔滨,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在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任教并从事翻译。1954年,他翻译出版了第一本文学译作、从俄文译本转译的匈牙利剧本《战斗的洗礼》;1955年,翻译了匈牙利轻歌剧《小花牛》、波兰长篇小说《赛璐珞工厂回忆录》(原名,在出版时改名为《一个人的道路》);1956年,与高恩德合译了《尤若夫诗选》。在50年代后期,傅惟慈开始从事德国文学翻译,先后翻译了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格奥尔格·毕希纳的历史剧《丹东之死》和亨利希·曼的

《臣仆》。1978—1979年,傅惟慈主编了《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选集》,开始译介英美文学作品,独立翻译了美国作家雷蒙德·钱德勒的《长眠不醒》,与梅绍武等人合译了《马克思和世界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降,他翻译出版了格雷厄姆·格林《问题的核心》,和冯亦代联手编译了《毛姆短篇小说集》,翻译了毛姆的长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吸引了众多读者,广受好评。1991年,他与董乐山合译了《基督的最后诱惑》;1996年,翻译了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2003年,重译了鲁多尔夫·洛克尔的《六人》。

可以说,傅惟慈毕其一生都致力于翻译事业,他一共出版了15部外国文学译作,涉及俄语、匈牙利语、波兰语、德语、英语等多种语言;翻译方式多样,有转译(即从俄语及德语译介匈牙利和波兰作品)、合译、独译和重译。

考察傅惟慈的翻译生涯,我们发现,他所处的时代场域跟所拥有的各种资本两相制衡,对其外国文学翻译中原文文本选择和译作的出版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具体阐述这些影响之前,我们先来简要介绍一下何为场域和资本以及这两个社会学概念在翻译学领域中的应用。

## 二、场域与资本概念解析及其在翻译学中的应用

社会学的各种理论范畴为西方翻译学所借鉴和

收稿日期:2020-05-07

作者简介:荆素蓉,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教学;李文华,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 三、场域对傅惟慈外国文学翻译活动的制约作用

场域之间总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20世纪50—90年代,傅惟慈的外国文学翻译活动就同时受到了来自权力场域和文学场域的双重影响。

权力场域指在社会中具有分配资本和决定社会结构的能力的结构空间<sup>[5]</sup>。从上文的概述可知,傅惟慈从事翻译活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权力场域对翻译场域实施了十分严苛的政治审查和选材控制。邹振环<sup>[6]</sup>曾谈到“文革”时期的刊物《摘译》如何被利用来为政治目的服务:“‘四人帮’的亲信‘亲自’把关,审查每一期外国文艺的《摘译》,在翻译什么作品的问题上,他们则根据‘洋为帮用’的原则,丝毫不考虑翻译工作者的意见。一部作品,只要他们认为对自己有用,就决定翻译。”1964年,上海一家出版社计划出版1848年纪念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诗集,约傅惟慈为他们翻译了十几首德文诗。“文革”期间,傅惟慈因为此事被诬陷写反动诗,他把当时出版社给他的约稿信、译稿以及孙用写的信上交才把事情澄清。他翻译的德国亨利希·曼的《臣仆》在“文革”之前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首肯,先在《世界文学》上选载了一部分,但此后书稿一直放在《世界文学》编辑部,“文革”后才得以重见天日。“文革”时期权力场域对傅惟慈外国文学翻译的文本选择、译作出版的制约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的文学译作能得以保存并在之后发行是极其不易的。可以说,当时的权力场域对翻译场域有着很大的制约作用,而直接的影响结果之一就是傅惟慈在那个时期没有任何译作得以出版。

除了权力场域,另一个周边场域——文学场域,也对傅惟慈的原文文本选择产生了倾向性影响。文学场域主要由个人(作者、文学代理人、评论家等)和其他机构(出版社、书店、文学界等)组成。20世纪50年代,国家非常重视无产阶级文学、亚非拉第三世界文学和一些小国文学的译介,而当时的权力场域有着“反美”倾向,文学场域也相应地抵制英美国家文学作品的翻译。傅惟慈在这个时期的代表性译作是匈牙利小说《战斗的洗礼》、歌剧《小花牛》,以及波兰长篇小说《一个人的道路》。看看这些作品的来源国和书名就会明白其倾向性和时代性<sup>[7]</sup>。可以说,文学场域极大地影响了傅惟慈翻译作品的选材,其当时的外国文学译作中没有英美国家作品,而能够得以出版的译作也呈现出明显的时代倾向性。

运用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中尤以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实践理论(Theory of Practice)为代表。该理论的场域和资本两个基本概念更是被频繁地用于分析影响翻译生产、传播、消费和接受的各种社会因素,成为社会学理论应用于翻译学领域的重要体现。

场域(field)是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中最基本的概念。按照布尔迪厄的观点,场域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如经济场域、文学场域、权力场域等。“场域的结构是斗争中的行为者及各种机构相互之间权力关系的状态;换句话说,也就是某种具体资本的分布状态。”<sup>[1]</sup>每个场域都是“一小块社会天地,一个相互体谅知情的圈子,或多或少地按照自身规律运行”<sup>[2]</sup>。依照这一理念,我们可以将翻译也视为一个特殊的场域,它的依赖性较强,和许多周边场域(如文学场域、政治场域和权力场域)相关联。翻译场域与这些周边场域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以至于翻译活动也相应地具有了十分明显的跨场域性。因此,我们要考察翻译场域之中的规则,就必须同时关注它和其他场域之间的互动。

从场域这一启发性概念衍生了“资本(capital)”的概念<sup>[3]</sup>。布尔迪厄将其定义为“积累的劳动力”<sup>[4]</sup>,可分为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三大类。经济资本可以“立即直接兑换成货币”<sup>[4]</sup>,是其他两类资本的来源。文化资本从客观层面可以指“文化物品(图片、书籍、字典、仪器、机器等)”<sup>[4]</sup>,也可以指人的教育资质,从主观上还可以指人精神和身体的持久倾向。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与拥有一个或多或少制度化的相互认识和相互关系的持久网络联系在一起”<sup>[4]</sup>。这三大类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又可以转化为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sup>[4]</sup>。象征资本是行动者凭借其所具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得到承认时获得的信用、权威地位等社会优势。就翻译场域而言,“译者受益于在源语社会发表的原作品中的象征资本。通过翻译,译者作为行为者对原作进行干预,将原作投入目标文学场域的逻辑系统和认可机制中,从而授予作者及其作品一定数量的资本”<sup>[3]</sup>。“当译者在翻译场域之中积累了足够的象征资本的时候,他/她便具有了改变规则的权力。”<sup>[5]</sup>当然,译者身处各种场域之中,其翻译活动及其译作的出版首先会受到来自不同场域各种资本的制衡影响,傅惟慈的外国文学翻译活动也不例外。

#### 四、资本对傅惟慈外国文学翻译活动的积极影响

不同的场域要求的资格不同。对资格进行归纳和分类就是布尔迪厄所说的“资本”。如上文所述,布尔迪厄将资本分为四种类型,其中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都对傅惟慈的外国文学翻译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如布尔迪厄所说,资本是一种投入(investment),一种“博弈感”和“筹码感”,可以让人获得更多的利益<sup>[11]</sup>。

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傅惟慈结交了不少翻译界和出版界的朋友,这为其文本选择及之后的译作出版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资本。1952年,在浙江大学的校友周文博当时在《文艺报》当编辑,傅惟慈请求他给自己介绍一两个翻译家,周文博便引荐了时任人民出版社编辑的孙用先生。傅惟慈将自己翻译的匈牙利诗歌拿给孙用帮助修改。1954年,他还在匈牙利学生高恩德的帮助下翻译了《战斗的洗礼》,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1956年,在高恩德的推荐下,傅惟慈翻译了尤若夫的诗选,这位匈牙利诗人在其祖国声誉极高。译文完成后再次交给孙用润色,最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可以说,这部译作的出版跟孙用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关系颇大。正是得益于这些积累的人脉资源,傅惟慈早期翻译的非英语文学译作才比较顺利地得以出版。1979年,傅惟慈结识了冯亦代。冯亦代在当时的出版界与文化界非常活跃,颇有影响力,曾与戴望舒等人在香港创办了文化刊物,在重庆创办了出版社,新中国成立后在外文出版社工作多年。1980年,冯亦代的《译丛》创刊,大力介绍西方现当代作家和文学流派,比如卡夫卡、乔伊斯、艾略特等,傅惟慈也加入了该刊译者的行列。可以说,傅惟慈结交的翻译家朋友和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都是他积累的资源,无形之中结成网络,成为他在翻译场域中的社会资本,在外国文学文本选择方面为他指引了方向,并且对其译作的出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50年傅惟慈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讲授对外汉语,同时也从事翻译工作。1963年,他调入北京语言大学外语系任教,教授英国语言及翻译课。“文革”期间,傅惟慈被安排到北京语言学院资料室打杂,每天整理材料,分发报纸,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文学书籍,其中就有英国外教威尔金逊先生带来的百本经典作品,傅惟慈翻译的格林的《问题的核心》便是从中找到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多年的翻译教学与实践经验及在资料室的工作经历也为

1978年以后,我国文艺政策回暖,对引进外国文学的限制开始放松。傅惟慈和“几个搞文学翻译的人不仅重操旧业,而且大胆引进西方现当代文学作品,甚至是引起争议的侦探小说”<sup>[8]</sup>。在当时氛围较为宽松的文学场域中,一度受周边场域影响而搁置的傅惟慈译作也得以出版。傅惟慈在“文革”期间翻译的格林《问题的核心》在1979年被收入“当代外国文学”丛书,1980年出版,首印50000册<sup>[7]</sup>。可以看出,英美国家文学译作在当时颇受读者欢迎。不过,即使这样,时代文学场域仍然存在不稳定因素。如他翻译的《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选集》也险些遭到扼杀,原因是出版社来了一位新领导,对惊险小说有不同看法,便要求退稿,最后几经波折才得以出版。险遭退稿和最终出版的经历充分体现了权力场域和文学场域之间的张力对翻译场域中文本选择和译作出版产生的制衡影响。

1991年,傅惟慈同董乐山合译的希腊卡赞扎基斯的《基督的最后诱惑》引发了争议,为此他还写了专论刊于《读书》杂志上,之后南京译林杂志社购买了该书在中国翻译发行的版权,最终才得以再版发行。正如马克·古安维克(Jean-Marc Gouanvic)所说,文学(翻译)场域的存在及自治程度对翻译作品的出版有着重要的影响<sup>[9]</sup>。有限生产场域的形成也是文学生产场域自治程度的体现。有限生产场域的生产不是为了迎合广大受众的趣味,而是“为了艺术而艺术”,生产者旨在赢得同行的认可,将自己的声誉归功于丝毫不向“大众”的要求让步<sup>[10]</sup>。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评判,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文学(翻译)场域显然还远未达到自治的程度。

20世纪末,中国的文学(翻译)场域依然不完整,没有严格的出版制度,也仍未达到自治的程度。即使作者与出版社签订合同,最终解释权或者出版与否还是由出版社决定。1996年,傅惟慈应董乐山之约翻译了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出版社则与董乐山签订了合同,但很快合同便遭撕毁<sup>[8]</sup>,直到2003年国内消除对此书的偏见才得以出版。作品的出版和翻译均以合同的签订为依据,但是编辑/出版商却可以任意撕毁合同,不遵守合同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作品采用的文学形式持有某种偏见。这对当时翻译家的翻译活动及译作出版都产生了不利影响,傅惟慈也未能幸免。

综上所述,20世纪50—90年代,傅惟慈所处时代中的权力场域和文学场域对翻译场域及文本选择、译作出版均产生了明显的制约作用。

傅惟慈积累了客观层面的文化资本,前者使他能够产出质量上乘的译文,很容易达到出版的要求,后者则使他能够很便利地选择经典作品作为原文文本,而作者作品在源语文化中的象征资本又为其译作的顺利出版增加了筹码。

象征资本是权力的体现,拥有象征资本的人会使自己手中的资本具有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傅惟慈之前积累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慢慢转换为象征资本,使他在翻译场域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改革开放以后,傅惟慈主编《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选集》时,与冯亦代和董乐山等四五个人构成了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既翻译经典作品,也译介通俗文学,甚至译介一些很前沿的现代派作品。傅惟慈开始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翻译作品,如他翻译了自己喜欢的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问题的核心》,这也是其象征资本逐渐形成的体现。如上所述,当原作者和原作具有象征资本的时候,译者能从中受益;当译者或译作得到目标语文学场域的认可时,原作者与原作也能获得相应的象征资本<sup>[3]</sup>。这两种情况在傅惟慈身上都得到了印证。他翻译的《长眠不醒》的原作者是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被称为和海明威、福克纳并列的大作家。正是作者钱德勒所具有的象征资本促使傅惟慈翻译了《长眠不醒》,出版后影响颇大。而毛姆的长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则通过傅惟慈的中文译本而广为人知,反过来赋予了原作者毛姆在源语文学场域中更多的象征资本。再如,傅惟慈还与梅绍武合译了《马克思和世界文学》,这本书对马克思一生发表的文学评论和美学观点做了系统性的阐述和分析,在西方评价很高。相应地,傅梅合译本也得到了当时读者的热情追捧。

1982年,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傅惟慈当选理事。2004年,他荣获了“资深翻译工作者”称号,对他个人在翻译界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也让他在翻译场域里拥有了更多的象征资本,进而也为其外国文学译作后续的出版奠定了更为牢固的基础。

综上所述,傅惟慈在从事翻译活动过程中积累了丰厚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在其所处时代的权力场域和文学场域存在诸多制约因素的情况下,这些资本发挥了重要的制衡作用,使他在原文文本选择、翻译过程、译作出版方面都比同时期译者更为容易,也相对顺利了许多。

## 五、结语

翻译活动并非独立于社会,选择何种文本来翻译以及译作能否顺利出版自然也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借鉴社会学理论来观照相关的翻译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更加宏观的视角来了解研究对象,进而对其做出更加全面客观的评价。本文选取著名翻译家傅惟慈外国文学翻译活动作为个案,运用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分析了傅惟慈所处时代的权力场域和文学场域对其外国文学翻译活动中文本选择和译作出版的制约作用,阐述了其积累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积极影响。

当然,影响译家翻译活动的因素并非仅有场域和资本,但是在傅惟慈外国文学翻译活动这一个案中,场域与资本之间的张力与制衡得到了突出的体现,所以才成为我们的关注点,希望本研究对译家研究、社会翻译学研究以及其他相关研究均能有所补益。

### 参考文献:

- [1] Bourdieu P.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 [2] 俞佳乐. 翻译的社会性研究[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3] Gouanic J-M. A Bourdieusian theory of translation, or the coincidence of practical instance[J]. The Translator, 2005 (2): 147-166.
- [4] 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 [M] // Richardson I G.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
- [5] 王悦晨. 从社会学角度看翻译现象: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关键词解读[J]. 中国翻译, 2011(1): 5-13.
- [6] 邹振环. 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M].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
- [7] 傅惟慈:我的翻译生涯和时代大气候息息相关[N/OL]. (2016-03-18) [2020-01-30]. <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4/2014-03-18/196438.html>.
- [8] 傅惟慈. 心中的大佛[M].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
- [9] 邢杰,庄慧慧,郭旋. 翻译社会学新探索——古安维克对布迪厄理论的阐释和运用[J]. 中国外语, 2019(6): 94-100.
- [10] 皮埃尔·布迪厄. 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M]. 刘晖,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 [11] Bourdieu P, Wacquant L J D. An invitation to reflective sociology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a.

[责任编辑 亦 筱]